



[编者按]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中,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,同时涌现出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历史名人。这些名人中,既有帝王将相,也有文人骚客,在社会发展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。其中有些历史名人,如秦始皇、张骞、刘邦、刘秀、曹操、狄仁杰、韩愈、包拯、欧阳修、沈括等,虽不属于河北人,但他们与河北有割不断的某种关系。本刊从2008年第9期起,向读者介绍这些历史名人在燕赵大地演绎的一幕幕活剧。

历史名人与河北(六):

狄仁杰河北留英名

文/梁 勇

狄仁杰,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、法学家,武则天时期著名的清官要臣。不仅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,而且外国的汉学家还根据他断案的典故,编著文学作品《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》。狄仁杰曾经在公元696—699年,奉命到河北抗击契丹和突厥的入侵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勤政为民,在魏州大名、赵州、定州,留下了显赫的足迹。

唐室砥柱 辅佐武周

在文学和戏剧、影视中的狄仁杰,是一个被艺术化的形象,也正是因为历代艺术家的演绎,使得狄仁杰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。

历史上的狄仁杰(630—700年),生于唐贞观四年(630年),卒于武则天久视元年(700年),唐代并州太原(今山西太原)人,字怀英,杰出政治家。从政后,经历了高宗与武则天两朝。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,转大理丞,改任侍御史,历任宁州、豫州刺史等职。武则天时期拜宰相。狄仁杰为官,为拯救无辜,敢于拂逆君主之意,保持体恤百姓、不畏权势的本色,始终是居庙堂之上,以民为忧,后人称之为“唐室砥柱”。

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以此为题材,编了一本《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》,也译为《大唐狄公案》,在欧洲广泛流传。因此,在欧洲,狄仁杰与福尔摩斯具有同样神奇的知名度。

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,武则天

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,她常称狄仁杰为“国老”。狄仁杰刚正不阿,敢于面对廷争,武则天“每屈意从之”。

久视元年(700年),狄仁杰病故,朝野凄恻,武则天哭泣着说“朝堂空也”。赠文昌右丞,谥曰文惠。唐中宗继位,追赠司空。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。狄仁杰墓位于洛阳市东12公里的白马寺附近。

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势来看,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君臣关系,开启盛唐清明政风。而武则天天晚年与狄仁杰的君臣关系,为武周王朝的朝政带来清明风气。正由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倚重,才避免了大唐王朝重演西汉吕氏叛逆的悲剧,实现了武周与大唐中兴的和平过渡。狄仁杰正是这一历史关键时刻重要的策划者和清醒的忠良将帅、精忠名相。

临危受命 魏州抗敌

公元690年,武则天当上女皇,将唐朝改为武周王朝,改元天授。公元696年,武则天先改元万岁登封元年,不久又改元万岁通天元年。而活跃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,则利用武则天统治动摇之时,发兵南下。

八月,契丹兵侵扰平州,在今卢龙、昌黎间的西硖石、黄獐谷,大败武周军队,武周大将曹仁师战败溃逃,大将张玄遇、麻仁节等成了契丹俘虏。契丹乘胜南下,直接威胁河北。

九月,武则天下令,山东(泛指今太行山以东河北地区)近边诸州建立

武骑团兵,准备抗击南犯的契丹骑兵。十月,契丹可汗李尽忠病逝,由孙万荣带领其众,南下烧杀掠夺,攻占了冀州(今冀州市),杀冀州刺史及城中的官吏、百姓数千人。又发兵向北,攻打瀛洲(今河间),河北震惊。

当时魏州(今大名)刺史怕契丹骑兵进攻,就把百姓全部赶到城里,坚壁清野,固守城垣。在这关键时刻,武则天起用年迈的狄仁杰,从彭泽县令加急到河北出任魏州刺史。

唐代魏州城,位于今大名县城东北,是河北南部重镇,控扼南北要冲。契丹军队一旦攻陷,便可大举南下,直接威胁中原和东都洛阳。

狄仁杰到职后,让百姓返田耕作。他认为契丹军队距魏州尚远,不能让百姓弃农入城。他大力对外宣称,契丹骑兵胆敢来攻,我等必有良策拒之。契丹主帅孙万荣闻听后,以为狄仁杰必有防御,所以引众北归,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。当地百姓歌颂之,立碑以记恩惠。不久,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。

狄仁杰在魏州时间虽短,但他以政治家、军事家的谋略,吓退南犯的契丹军队,使魏州人民免遭兵灾之苦,赢得了当地民众和官吏崇敬。魏州官民为纪念其功德,神功二年(698年)为狄仁杰建造了生祠,并刻“大周狄梁公祠堂之碑”。后祠堂及碑因战乱而毁。

唐宪宗元和六年(811年)十一月,



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原址为狄公重建祠堂及碑,改为“大唐狄梁公祠堂之碑”。现此碑存于大名县城东孔庄村西北公路南侧,碑文记述了狄公任魏州刺使时的政绩和重修此碑的经过。1982年此碑列入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相传,狄仁杰在魏州任上曾指导百姓酿酒,百姓为纪念他,命名为狄留,后来谐音改为“滴流”。

北上幽州 安抚河北

神功元年(697)三月,74岁的武则天,派大将北上抗击契丹。

清边道总管王孝杰等受命将兵17万与契丹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(今卢龙县附近)。王孝杰亲帅精兵为前锋,结果前进到绝壁悬崖,契丹主力突袭,王孝杰坠崖殉国,将士死亡殆尽。

武周大将武攸宜率军屯兵渔阳,闻知王孝杰等阵亡,不敢进。契丹乘胜进军幽州,攻陷城邑,剽掠吏民,武攸宜派兵出击,不克。

契丹主帅孙万荣打败王孝杰后,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,留其老弱妇女、所获器仗资财,率领精兵进攻幽州。又唯恐突厥默啜袭其后,所以派人与突厥默啜修好。结果突厥发兵攻取契丹的新城,俘虏了契丹主孙万荣的家属。孙万荣的军队得知后方遭突厥偷袭,一片恐怖,众叛亲离,相互残杀。其部将斩了孙万荣首级投降,余众及奚族将士投降于突厥。

由于突厥默啜为武周军队抗击契丹作出贡献,武则天册立默啜为大单于、立功报国可汗。

不久,武则天以狄仁杰为鸾台侍郎、同平章事,委任狄仁杰为宰相。

狄仁杰分析了多民族关系的历史,主张采取民族和解政策,利用契丹与突厥的矛盾解决边境之事。他提出,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,委任他管理四镇,固守安东。“省军费于远方,并甲兵于塞上,使夷狄无侵侮之患!”他还主张,诏令边兵,加强守备,聚资粮,以逸待劳。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;贼深入则有颠蹶之虑。如此数年,可使契丹、突厥等蛮夷不击而服。

狄仁杰的民族政策和强边防御



战略,得到武则天赞许。而且狄仁杰作为宰相兼河北道安抚使,安抚州县,招抚流亡,劝民归乡,安居乐业。

当年十月,狄仁杰调查发现定州北平(今顺平)、义丰(今安国)两地,因抵抗契丹、坚守城池,显忠义之风。所以奏请武皇给予抚恤。武则天诏,改北平为蓟县,改义丰县为立节县。对参与守城的百姓,免一年税赋。

狄仁杰非常重视重用少数民族将领,以此培植多民族和睦的国家形象。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谋略,体现了狄仁杰高瞻远瞩的华夏多民族亲和胸怀。

对在河北多年征战中的少数民族将领,狄仁杰乐此不疲地向武则天举贤荐能。契丹猛将李楷固虽曾屡次要率兵打败武周军队,侵扰河北,但兵败来降,有人主张处斩。狄仁杰则认为李楷固可谓骁将之才,若恕其死罪,必能感恩效节,于是奏请武皇,授其官爵,委以专征,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。果然,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,凯旋而归,武则天设宴庆功,举杯对狄仁杰说“公之功也”。

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,有人对狄仁杰说:“天下桃李,悉在公门矣。”狄仁杰回答:“举贤为国,非为私也。”狄仁杰为国举贤,不是为其私利。尤其暮年的狄仁杰,清心寡欲,廉洁为

国,处处为大唐江山和武周稳定,为黎民安居乐业运筹帷幄,得到武则天和朝野尊敬,在当时军民中,树立了盖世英名。

北驱突厥 护国安民

圣历元年(698年),是狄仁杰力挽大唐、武周乾坤的关键一年。68岁的他用高度的政治智慧,力劝比他年长7岁的武则天,将太子之位还给儿子李显。

这年,武则天已风烛残年。其侄武承嗣、武三思都企图请立为太子。尤其是与武三思私通的上官婉儿,深受武则天宠信,执掌政事,代表女皇拟批奏折。她极力推荐武三思作为太子。是复立李氏子孙为太子,还是立武家子弟为太子,武则天费尽思量。

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,劝武则天顺应民心,还政于庐陵王李显。他从母子亲情的角度劝她:“立子,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,承继无穷;立侄,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。”武则天说:“此朕家事,卿勿预知。”

狄仁杰郑重回答:“王者以四海为家。四海之内,何者不为陛下家事!君为元首,臣为股肱。况臣位居宰相,岂得不预知乎?”

狄仁杰的这番劝诱,终于使武则天听从狄仁杰意见,亲迎庐陵王李显回宫,立为皇嗣。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、史学家称为再造唐室的忠臣义士。

三月初九,女皇托病,召回庐陵王李显。

就在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的这年秋,突厥南下骚扰河北。

夏六月,武则天命侄孙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,欲娶突厥可汗默啜之女为妃。默啜不仅不允,而且率领突厥军队一路南下,跨过长城,攻陷定州,杀害定州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。

武则天派遣使臣尚书阎知微降突厥,被默啜封为南可汗,让他招谕赵州(今赵县)。阎知微与突厥兵卒在赵州城下拍手高唱为突厥可汗歌功颂德的《万岁乐》。守城的武周将军陈



令英在城上对阎知微说:“你可是大周尚书,如此无耻为虏唱颂歌,不感到羞耻吗?”结果,赵州长史唐般若投降突厥,赵州城沦陷。而赵州刺史高睿与妻秦氏宁死不屈,被默啜杀害。

八月十三日,女皇令武重轨、张仁稷、李多祚等率兵30万讨突厥。但武重轨招募兵士一个多月没招满1千人。武则天终于明白了抗击突厥与皇权传承的关系,认识到民心仍向李唐,采纳狄仁杰的建议,立43岁的李显为太子,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,实

际上领兵出征的是副帅狄仁杰。

默啜得知狄仁杰亲率大军北征,随即把在赵州、定州掠夺的男女八九万人全部杀死,从五回道(今易县西)北撤。一路掠夺、残杀百姓,抢劫财富、牲畜,不计其数。武则天手下一些边境大将,虽拥重兵却不敢逼近默啜。只有狄仁杰领兵10万向北追击。默啜步步败退,逃到大漠以北。

武则天改任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,安抚河北诸州官民。

面对战乱后河北的凋残景象,狄

仁杰上疏,请求武皇允准,采取了四条措施:一是赦免河北诸州百姓;二是运粮食到定州、赵州,赈济贫困百姓,劝课农桑,鼓励农民回家复业,进行自救;三是修缮沿途驿道,方便王师北进、南下的交通;四是严明军纪,严禁军队侵扰百姓,犯者必斩。

正是由于狄仁杰安抚有方,使河北诸州很快恢复安定。狄仁杰挥师凯旋,受到武则天朝野隆重欢迎。而年迈的狄仁杰心力交瘁,回到京师,病倒府第。

但狄仁杰病榻不忘国忧,上奏武皇,建议在河北设置武装骑兵,准备抗击突厥南侵。圣历二年(699年),十二月,武皇诏令,河北、河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,每150户,推选兵15人,马一匹,集中训练,习练武备,平时耕种,随时准备抗击外虏。

狄仁杰作为杰出的政治家,不仅赢得朝野尊敬和各地百姓的爱戴,甚至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敬畏。

在狄仁杰病逝后的公元702年,突厥再次南下,攻掠并州(今太原),武则天起用雍州长史薛季咏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,统领河北地区的沧州、瀛洲、易州、恒州、定州、幽州的各州军队。不久,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州、平州、妫州、檀州防御,以备突厥。因此,民间传说,“狄公在,北边宁;狄公去,边境危”,反映了边境地区民众对这位忧国爱民的贤臣深深的怀念。□



高原春/逸明摄影

(上接第40页) 基本事实:二三百年来代代相传、保存完好的胡同四合院,之所以成为破败的“危房”、大杂院,关键在于房屋产权的缺失。《采访本上的城市》还揭示了另外一些深层制度。分税制改革之后,由于地方政府税利不足,普遍地走向靠批地卖地获利的“土地财政”;而本应成为基层政府最重要税源的不动产税却付阙如。“圈地”成为流行语,出现了比“建设性破坏”更为严重的“规划性破坏”。其中居然还有国土局和规划局之争。多年来,我国的城市规划教材名为《城市规划原理》,其来源的英文原版却是《城市土地利用规

划》,遗漏“土地利用”的误传误读,土地和空间规划的分离,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两个土地使用管理部门的国家!

重要的是变化已经出现。GDP崇拜已经过时,房价神话已经破产,利益集团已经彰显,各地不断出现的“最牛钉子户”,显示制衡的力量也开始出现,废除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的呼声日高。上海拆除外滩“第一桥”也许是一个转折的信号,呼应着波士顿悉数拆除高架中央大道,将交通引入地下以修复“城市伤口”的变革。打破首都的单一中心、在通州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的规划也已浮出

水面。在这一新的图景中,我们看到的是操纵城市命运的两种力量的消长和角力。城市化进程中的“政府悖论”,说是在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路径中,政府既是城市化最重要的推动者,在很多情况下也成为反城市化的力量。在后一个方向上,广州、深圳强力清除“城中村”、北京市“画家村”危局和围绕“小产权房”的博弈,深刻地体现了城市自发的生长力量与政府强力规制行为之间的冲突。“谁的城市”的提问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而现实,因而,《采访本上的城市》是一场没有终结的采访,巨变之中的中国城市是一本描画不尽的大书。□